

「近代中印關係 史國際學術討論 會」紀實

邱鐘義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印度在亞洲為僅次於中國的大國，中國和印度的關係也一直是國際矚目的研究課題，但自 1950 年代起，海峽兩岸分別因為不同的因素和印度交惡，以至於中印關係的研究陷入停滯狀態。這次在國史館和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下，舉辦了近代中印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期待能為中印關係史的研究打開新局。

首先，由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致詞。呂館長強調這次的討論會有兩大特色，首先是小而美，雖然僅為一天的討論會，但與會學者來自臺灣、中國大陸、美國、印度各地；其次這次討論會也是國史館第一次舉辦中印關係相關的會議。由於研究中印關係的學者人數不多，此次討論會涵蓋 19 與 20 世紀的中印關係，同時以多面向的研究來呈現。此外中華民國與印度的關係在 1995 年以後大幅改善，因此希望由這次會議開始開展對中印關係的研究。

其次，由蔣經國基金會副執行長陳純一先生擔任貴賓致詞。陳副執行長表示除了代表朱雲漢執行長和主辦單位及與會學者致意外，也特別感謝了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中國近代史學會的支持，同時陳副執行長也再次的強調了印度地位的重要以及臺灣對於中印關係認識的缺乏，希望能夠藉由這次會議增進中印關係的開展。

接下來進行的是以「中印關係的過去與現在」為題的座談會，由呂芳上館長主持，與談人有美國華盛頓大學南亞中心主任暨

國際關係教授楊雅南（Anand A. Yang）、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石之瑜以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李登科。呂館長簡單的介紹諸位與談人後，首先由楊雅南教授發表談話。楊教授認為我們對於中印關係的了解，在歷史層面似乎比現實層面還要來的透澈，可見無論是在中國或者是印度，都十分缺乏對對方的關注與了解。我們過去對印度有著殖民主觀的刻板印象，但實際上由 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印度對於中國的印象和想法是十分正面的。而印度人因為佛教文化的關係，對中國是抱持著親近之意的。現在的美國對於印度也十分關注，但是印度和美國的關係十分奇特，並不能以「正向」來形容，而由於美國因素的加入，現在的中印關係已經由中印雙邊關係轉變成中美印三邊關係。另外楊教授認為目前中印關係的幾個重要關鍵在於經濟發展、邊界軍事問題以及核能問題上。石之瑜教授接著楊教授的想法，認為中印關係之間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中國將中印關係視為雙邊關係，但印度卻將中印關係定位為國際框架之下的多邊關係中的一環。印度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情感是十分複雜的，他們有著一種長久的視野，認為中國傳承已久的觀念是不能由印度來改變的，因此對於中國，印度是被動的因應中國的舉止；英美則不同，希望以他們的價值來改變中國。中印雙方看待彼此關係的觀點不同容易導致對彼此的誤會，但是由於雙方都是文明古國，處

理事情上都比較有耐心，因此現在的中印關係還算和緩。第三位發表的李登科教授則由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著手，說明中印關係的開展由很早就開始了。但是中華民國由於印度在 1949 年即承認中共政權的關係，雙方的關係停滯了很久，甚至以拒發簽證作為武器，直到 1995 年這項限制才解除。1995 年同時也是中印關係破冰的開始，中印互設辦事處。由於李教授長期參與中印之間的文化交流，因此說明了很多目前文化交流的現狀，並以一些數據說明目前中印之間的交流的確還有待加強。



開幕座談。左起石之瑜、呂芳上、楊雅南教授。
(攝影／蕭李居)

第一場討論會的主題為「跨文明認識與對話」，分別請到楊雅南教授、上海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章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宥霆以及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史教授沈丹森（Tansen Sen）發表。楊雅南以“China and India are One: A Subaltern’s Vision

of 'Hindu China' during the Boxer Expedition of 1900-1901" 為題，講述了一名英屬印度軍士兵在八國聯軍時在中國的見聞，這名士兵 Singh 將他的見聞寫成遊記並出版，成為今天我們了解當時印度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一份重要史料。而章可則反過來由中國的文獻中來看當時對印度的想法，其論文名為〈交織的故事：19 世紀漢語文獻裡的英治印度〉。內容由中國士人所著的《海國聞見錄》、《海錄》、《四洲志》、《瀛環志略》、《海國圖志》等書中對於印度地區的描寫，建構當時中國士人對印度的了解；另外章可還參考了當時宣教士在華的漢語紀錄中提到印度的部分，來看看外國人眼中的印度，最後在文章的末尾，章可特別提出了藉由印度的遭遇反省中國在世界處境的「亡國」敘事，認為印度即為中國的前車之鑑，同時也將印度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統治的情況和漢民族反抗滿州統治做連結。接下來發表的是李宥靈教授，以〈一戰之後文明論域中的泰戈爾與中國——從其與馮友蘭的對話說起〉為題，以現代印度偉大的哲學家泰戈爾和馮友蘭之間的對話為引，介紹泰戈爾對於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想法，以及泰戈爾的學說在被引進中國後被中國學者們所誤解的理由，最後也期望能藉由這種介紹，使人們能夠重新對泰戈爾的思想有所了解與體認。最後一篇文章則是由沈丹森教授所帶來的“Pan-Asianism and India-China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文中簡單的

介紹了由日本人岡倉天心所倡導的泛亞主義，以及泛亞主義在印度和中國的發展和實踐，在政治人物方面特別提到的是中國的孫中山和印度的尼赫魯，這兩位國父都對泛亞主義中自己的國家所將扮演的角色有所期許，而在泛亞主義的實踐上則是以泰戈爾和譚雲山所共同創立的中國學院，以及太虛、法舫兩位法師的印度行為例。

第一場討論會結束後評論人和聽眾皆提出了許多問題來討論，也為 4 位發表人的文章補充了不少，例如對於泛亞主義，瑪姐玉教授就認為泛亞主義是西方的觀念，對亞洲的定義也不清楚，中印所謂的泛亞主義其實是以佛教思想為根基的，一開始就屏除了西亞的回教國家。而徐啟軒教授在評論時也說明了日本的泛亞主義比較有帝國主義的色彩，而中、印當時皆非帝國，比較沒有這種因素，同時也提到了在中國「一帶一路」的新政策之下，泛亞主義能否因此復活。

第二場討論會則是以「戰時外交與國際事務」為主題，邀請到印度中國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瑪姐玉 (Madhavi Thampi)、國史館協修廖文碩、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徐啟軒以及國史館修纂處前處長侯坤宏發表論文，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朱泓源教授主持。首先是瑪姐玉教授以“Indian Envoys to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ir Reflections on China” 為題，講述了梅農 (K.P.S. Menon) 和潘尼加 (K. M. Panikkar) 兩位駐華使節在駐中華民國期

間的中印外交關係，此篇論文主要以日記和回憶錄為主，主要是兩人對於當時中華民國統治階層的看法和國共關係的意見，例如梅農對於蔣介石的看法是認為蔣像邱吉爾或拿破崙，而潘尼卡則認為蔣晚生了一個世紀，而兩人對於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困境皆有所體悟，梅農並且認為國民黨的貪汙腐敗極為嚴重，且當時國民黨所謂的民主完全是假象，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未來並不感到樂觀。而在國共關係上，因為德里政府的訓令，兩位大使皆對國共關係不發表看法，而關注的重點在於不論是哪一個政黨，其對於邊界問題的態度為何？潘尼卡認為中國對於中印關係就像大哥在看小弟一樣，仍有天朝思想留存，也提到了1947年泛亞會議召開時，印度邀請西藏以獨立國家身分出席，此舉大幅影響了中印關係。第二位發表人廖文碩則是以〈王芃生與國民政府戰時結盟外交——以印、緬工作為中心（1937-1942）〉為題，講述了王芃生與其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在抗戰期間對於東南亞地區的情報工作及其成果，特別是在印度和緬甸地區。在戰爭初期，主要蒐集的情報分為三方面，一為英國治下的印、緬政情；二為日本對印、緬外交工作的進展；三為日軍南進的動態。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則在印、緬地區大力宣傳反日，並和英國情報組織合作，主持對此地區的宣傳及情報業務，並取得了相當的成果。接下來則是由徐啟軒教授所講的“Tan Yunshan and

Nationalist China's India Diplomacy”，由近代中印交流上極為重要的譚雲山為例，說明國民政府對印度的外交政策並兼論泛亞主義在中印兩國的發展。徐啟軒以「現代玄奘」來形容譚雲山，他頻繁的來往於中印之間，期待建立起非政治化的泛亞主義，並為兩國的發展搭起了橋梁，也促成了戰時的中印外交，以及1939年尼赫魯的訪中和1942年蔣介石的訪印。但非政治化的泛亞主義有其侷限性，在中印政治上有所衝突時，譚雲山的泛亞烏托邦終究無法實現，他也因此和國民黨政權決裂。這場討論會的最後一篇文章則是侯坤宏教授帶來的〈佛教外交：以太虛法師訪問印度為例〉，本文詳細介紹了1939年底太虛法師訪問印度的行程，並兼論其後戴季陶和蔣介石兩次出訪印度。侯坤宏認為此三人分別訪問印度，是中印關係的三部曲，其中太虛法師為先行者，背後雖然有官方的支持，但本質上仍是宗教活動，而戴季陶、蔣介石的訪印則慢慢走向政治色彩，其原因在於當時印度的殖民母國英國對於這種帶官方色彩的接觸有所抵觸，也因此太虛法師的印度行，除了宗教交流外，也有試探的意味在內。

這場的討論依舊十分激烈，例如主持人朱法源即提出王芃生的情報工作究竟算不算成功？因為最終國軍仍在緬甸敗給日軍。而李登科也提出關於王芃生個人評價的問題。對於前者，廖文碩則答以情報工作終究只是輔助，在整體實力不如人的情況下，再

良好的情報也不能避免失敗，而對於王芃生的評價，負面評價多來自龔德柏，而這牽扯到軍統和國研所之間爭奪情報主導權的問題，龔出身軍統，對於國研所的王芃生自然沒有好評。

最後一場討論會則由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陳鴻瑜主持，以「邊界歷史糾葛」為題，邀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孟慶龍、印度巴納斯印度大學歷史系教授嘉馬希（Kamal Sheel）、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副教授關培鳳和國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陳牧民發表論文，但後兩位因故未能到場，故由代理人代為宣讀。孟慶龍以〈英國與中印邊界問題的緣起〉為題，詳細的介紹了中印邊界問題的由來，是英國對西藏一連串政策的後果。英國在 20 世紀初期兩次入侵西藏，企圖將西藏和中國切割，逐步排除中國政府對於西藏地區的主權，並提升西藏的地位，而在西姆拉會議中，英國政府運用各種方法壓迫中國代表陳貽範，強迫中國承認西藏和印度交界的「麥克馬洪線」，而陳貽範也由不簽正式文件或簽不同名字的方式以示抗議。這些糾葛在印度獨立以後造成了中印邊界問題，但實際中印問題的元兇應該是英國。嘉馬希則是發表了“India-China Interaction (1911-1949): ‘Ambivalent Connectedness’ and Indian Sources for study”一文，認為中印兩國之間的互動和連結必須通過對兩國文明的異同來了解，同時認為

西方文明的入侵影響了中印兩國現代觀的形成，而宗教的歧異是兩國文明上很大的不同。在印度，宗教是其民族主義的重心之一，但在中國則完全沒有宗教因素參雜，另外在印度，政治和道德是可以分開來處理的，但在中國則是不可分割的，就是這些文明的差異造成了兩國在面對西方時所形成的現代觀不同，進而影響了現在的兩國關係。此外嘉馬希也提供了大量的印度史料來源，為之後的研究做了很大的貢獻。第三場則是關培鳳教授的〈印度處裡對華邊界爭端策略研究——以「阿魯納恰爾邦」的炮製和管理為例〉，藉由印度對於爭議土地上所設立的「阿魯納恰爾邦」成立和發展的沿革，來說明印度政府藉由軍事、行政和外交三方面的手段，將此塊爭議性土地逐步蠶食，成為印度的一個邦。軍事上印度多次主動出擊，以攻對守，雖曾在中印邊境戰爭中失敗，但由於中國軍隊的撤退，印度軍隊繼續進占此區，並大力發展軍備，威嚇中國；而在行政上，則是逐步將此地區的統治單位升級，由「東北邊境地帶」到「東北邊境特區」，再成立中央直轄區，最後升級為阿魯納恰爾邦，並大量移入人口與修築道路，強化此地區和印度中心地帶的連結；外交上則是由拒絕談判到以軍事和行政為輔的談判策略，可見印度政府對於此段爭議地區的用心程度。最後一場則是由陳牧民教授發表“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actions to Sino-India War and the Border Issue: An Analysis of

ROC Diplomatic Archives 1962-1964”，企圖釐清在 1962 年中印邊境衝突並引發戰爭之後，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如何因應這個情況。文中提到了蔣介石政府雖然不是這場戰爭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他對中印邊界問題上強烈的反對麥克馬洪線，這種不切實際的態度對於讓中印關係正常化是明顯的阻礙。其次中華民國政府很怕印度將此事提交到聯合國處理，由於中華民國此時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提交聯合國處理將會使世界的目光轉移到中華民國如何處理這場其實和他無關的戰爭上，這很可能傷害的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因此蔣政府極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但蔣政府仍藉此機會企圖緩和自 1949 年後即中斷的中印外交關係，避免公開攻訐印度政府，將其淡化為印度民族主義

者和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也試圖和印度政府接觸，印度政府也藉此和中華民國展開一些合作，特別是在情報方面，但最終臺北方面認知到印度不可能改承認中華民國，於是慢慢地放棄了這些合作。

最後一場討論會後，由呂芳上館長做閉幕致詞，感謝與會學者與來賓後，此次的近代中印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圓滿閉幕。本次討論會邀請國內外近代中印關係史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包括中外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新聞學等學有專長人士共聚一堂，進行跨學科之交流、研討，反映國際學術潮流，實屬難得。近代中印關係史仍具有極大開拓空間，臺灣學界仍應逐步培養人才，並持續積極規劃國際學界的繼續交流。